

雪蓮花 (奇花異草物語之一)

悄悄地
我來了
靜靜地
我開了
美麗孤傲
潔白無瑕
只有藍天知道
只有雪峰垂注

一生只此一回
此時,正是我等待了一生的愛情
此時,正是我積蓄了一輩子的盼望
有人誇我端莊矜持
玉潔冰清
有人贊我純情專注
忠貞不二
Yes, I am. Thank you.

我從不爭春光的明媚
我從不懼氣候的嚴寒
我從不嫌山地的貧瘠
我從幽暗中成長
我從石縫裡迸出
我在寒光下綻放

我是雪山的兒女
我是冰峰的後人
我是藍天上的大花邊
我是白雲下的小掛件
一生只此一回
雖然美麗得讓人心碎

雖然短暫得讓人憐憫
雖說無奈
但是夠了!
是夠了!

親愛的人們,
若你們真心喜歡我
請來
高山雪原!

悄悄地
我來了
靜靜地
我開了!



池青橡

潔白無瑕的雪蓮花

澳華新文苑

第1230期(B)

非馬詩四首

獨家風景

把所有的
陵墓古跡文物文化
道德信仰人倫人性
統統搗毀之後

他終於心安
體更安
大喇喇躺在天安門廣場上
獨佔風光

天安門

作為一個
世界和平的大廣場
必須設法
吸引成群的鴿子
自天外飛來

讓它們在廣場上踱方步
讓它們在遊客的手上啄食
讓它們肆無忌憚地咕咕
在銅像的頭肩上撒野

毛澤東紀念堂

寄存了所有的身外物
以及喧嘩
便紛紛攀附
長龍的尾巴
等著瞻仰
死神的真面目

我不得不佩服
化裝的巧妙
在每張漠漠的臉上
竟看不出
絲毫的驚訝
(或會心的微笑)
對著大門口
冷冷站立的
一對牌示

「請勿吐痰」



微雨中登天安門

從這樣的高度看下去
原來你們是如此的渺小
矮矮都不如

要不是天空陰沉著臉
還有那些便衣警衛耽耽虎視

說不定我也會高舉雙臂
豪情萬丈地大聲宣佈

今天
我——
站起來了

追憶董寧——讓愛回家，歌聲永不落幕

驚聞董甯妹于2025年9月21日仙逝，心痛如絞。這位悉尼知名歌手、詞作者、音樂人，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留給人間一曲未竟的歌。

董寧，是歌者，更是愛心大使。她從新疆軍區文工團的舞臺走來，移居澳洲後仍用歌聲搭建起一座座愛的橋樑，把中華文化的芬芳播撒在悉尼的熱土。無論在舞臺上或是社區公益中，她始終用真情凝聚人心，讓中華文化與愛心在海外閃耀。

疫情最艱難的時刻，她以真摯的心創作並演唱《讓愛回家》。那旋律像一股暖流，穿越山海，傳遞海外遊子的赤子之情。她用音樂凝聚希望，讓大愛插上翅膀飛回祖國。

她熱愛家鄉，也熱愛朋友；她為新疆發聲，她把慈善當作日常；她性格陽光，笑容爽朗；她的歌聲清澈，她的心胸明亮……回憶如潮水般洶湧，

董寧一聲聲甜蜜的“姐”猶在耳邊迴響，卻匆匆去了天堂！悉尼的夜下起了雨，老天爺也落淚啊，筆者的心中大雨傾盆！

董甯妹已化作彩雲，遠行天際。可那份真情與歌聲，仍在人間回蕩：“讓愛回家，我在等待，讓愛回家，回家……”

願天堂也有舞臺，鮮花盛開，掌聲如潮！願董寧依舊歌聲嘹亮，願她的大愛，繼續在人間傳遞！願天堂沒有病痛，願董寧一路走好！

撰《蝶戀花》一首，悼董寧：

清影如歌天外遠，笑語猶存，往昔情難遣。一曲回家牽萬願，星光點點心如暖。

此去雲端人不見，但願芳華，化作長河伴。若聽夜半風聲歎，便是穿穹隨月轉。

曼曼



《歌手董甯妹》(曼曼攝影)

戈壁荒漠上悲憤的呼喊

——讀趙旭《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

四、對制度暴力的控訴：《證言》構成了民族記憶中一塊不可或缺的基石

(接上期)趙旭為自己的大著《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撰寫了自序。他在老家蘭州寫於2014年4月16日的這篇自序，題為“歷史不會忘記”，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是批判毛澤東的深刻有力的檄文。毛澤東及其一夥製造幾千萬中國人死亡並使過億人慘遭迫害，但毛至死仍居於毫無悔意地說，他是不下“罪己詔”的。在這篇自序裡，趙旭痛斥毛澤東的滔天罪行，悲憤地說：

中國人民前後總為了民主自由交出的學費太昂貴了，可是我們並沒有對失敗和教訓認真加以總結，沒有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將政治體制改革放在議事日程上，更沒有讓防止悲劇重演的民主憲政在中國出現的跡象。



趙旭1985年在夾邊溝的毛夾山上。

的確如此。至今毛澤東雖死去已近半個世紀，但其陰魂不散，而且頭像還高掛天安門城樓，死屍還保存在紀念堂供愚昧民眾頂禮膜拜，所謂毛澤東思想還被中共政權奉為一個指導思想。在今天中國這種局

面下，每一個讀者都會深深感到，趙旭的大著《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格外珍貴，趙旭這種追查歷史真相的精神和人格格外珍貴。

關於趙旭以及他這部大著的意義，應該還可以多說幾句。

親人的死亡，最易被歸入“私域”。但《證言》恰恰證明：私人之痛可成為公共之真。趙旭追問他孛爺死因，不是情感的自溺，而是倫理的蘇醒——它使敘述者意識到，個體並非孤島，命運的海流由制度性暴力的深層洋流所驅動。也因此，趙旭從“為一人立傳”轉向“為群體作證”：良知成為史學的引擎，而不是尾部注釋。歷史並不天然說話。歷史的第一個門檻，不是方法，而是勇氣。趙旭在三十年堅忍不拔的行走與傾聽中，走出了家族的庭院，跨入民族的記憶。於是，問題也隨之轉換：我們如何以個人的淚水，清洗公共敘事上那些固化的塵垢？

趙旭以他的大著證實了：口述史的力量，不在於修辭，而在於在場。倖存者的敘述，讓“餓”、“寒”、“勞役”、“互埋”這些

詞語從抽象名詞變為具象的處境：早晨還在埋人者，黃昏便成被埋之人；力竭者為自己刨坑，以最後的禮法保全自尊……這些碎片並非獵奇的細節，而是對“人何以為人”的極限拷問。《證言》把歷史從宏大敘事的高空拉回地面，使“事件”復歸“經驗”。在官方寫作選擇沉默或回避的年代，證言成為抵抗的文體：它修復記憶的斷層，也揭露語言的偽善——當“改造”、“勞教”、“右派”成為技術性詞彙時，證言把它們還原為疼痛的同義詞。

趙旭此書不能在中國出版，這提示人們：歷史書寫不只關涉事實，也關涉許可。於是，趙旭轉以小說曲折表達，讓真相先在隱喻裡存活；又在境外出版，使記憶穿越邊界。真相不得不遠行，記憶被迫在異鄉落地——這不是“傳播路徑”的偶然，而是“記憶政治”的證據。三十年的訪談、查檔、比對，是一種近乎殉道的史學：它以耗損身心為代價，換取事實的可見性。歷史在此不再是學術的“對象”，而成為倫理的“召喚”；書寫者不只是“研究者”，更是“見證倫理”的承擔者。

的確，如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強調，“他者之臉”在呼喚倫理責任。《證言》這部書不是情緒的堆砌，而是一種道德的實踐。書中每一張臉都從“對象”轉為“呼喚者”：敘述者不再是冷靜的採集器，而是被召喚的見證者；寫作不只是“再現”，更是“承受與承擔”。作者趙旭與倖存者同哭，不是放棄批判的距離，而是在確認：沒有共情的歷史則只剩下冷拷貝。為七十多位倖存者立下證言，就是為無數無名者點亮路標。命名，是對抗遺忘的第一步；守夜，是防止重演的一道防線。記憶並不能改變過去，但它能改變我們與過去的關係——從被動承受走向主動清算，從沉默共謀走向公開問責。

記憶與歷史的較量，其實是“時間的政治學”。歷史試圖用線性敘事馴服時間，把災難放回年表的抽屜；記憶則把時間折返，讓未竟的疼痛繼續召喚我們。所謂“延遲的正義”，並非虛詞：當事實被確認、當證言被聆聽、當名字被呼喚，正義才在遲到中抵達。記憶的職責，不是把過去封存為“已經發生”，而是不斷提醒“仍在發生的可能”。因此，記錄不是懷舊，紀念不是撫慰；它們是面向未來的制度性預防，是給下一代的公民教育——讓他們知道：任何以“集體”之名而傷害個體的權力，都需要被持續地、公開地、制度化地約束。

對！當我們一次次念出那些被風沙吞沒的姓名，歷史不再只是向後流動的時間，而變成向前伸張的正義。記憶不是過去的倉庫，而是未



趙旭先生(左)和本文作者何與懷博士(2025年3月26日攝於悉尼)。

來的憲章；寫作不是哀悼的儀式，而是防止重演的規約。

荒漠沒有聲音，但《證言》讓沉默開口。那些在風雪中死去的人，終於能以證言的方式再次活過。這樣，荒漠就不再是歷史的終點，而成為公共良知的出發地。

這部《證言》提醒我們：遺忘是另一種死亡，而記錄與傳承，是對亡者最好的紀念，也是對未來最深的警示。它不僅是一本書，是對歷史失語的抗爭，是對制度性遺忘的抵抗。它讓人們看到：當官方史學選擇沉默時，民間的聲音才是保存真相的最後防線。夾邊溝的故事提醒後人：歷史的傷口若被掩蓋，創傷便會延續；唯有直面與記錄，才可能避免悲劇重演。

這種記錄之所以極為珍貴，因為它不僅保存了記憶，更是對制度暴力的控訴。

像趙旭這樣的個人執念，恰恰構成了民族記憶中一塊不可或缺的基石。

(2025年9月9日於悉尼)

何與懷